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卷1996年第5期

论美国政府对纳粹暴政下欧洲犹太难民的政策

赵 杰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犹太人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600万无辜生灵死于非命。人们难以理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民族自始至始把盟国的事业视作自己的事业,千方百计地帮助盟国去赢得胜利,然而,与德国交战的同盟国家,特别是作为西方民主国家象征的美国却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行动,却帮助救援那些德国魔掌下的犹太人。本文通过反思这段悲惨的历史,旨在探讨美国对纳粹暴政下欧洲犹太难民的政策、根源及其影响。

1 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开始了他反动的排犹暴行。1933年至1939年,纳粹颁布一系列反犹立法,疯狂地进行反犹宣传,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政治、经济和基本的公民权力,其处境急剧恶化,实际上沦为无国籍的难民。于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难民急于逃离德国,继而逃离欧洲大陆。当时有数十万犹太人强烈要求去美国避难,对此,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一方面接纳极少量的难民,借以表明美国"并非不愿意而确实是没有能力"接纳大量的难民;另一方面为平息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1938年7月由罗斯福总统发起,美、英、澳等32个国家的代表云集法国埃维昂,召开了一次关于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并成立了一个政府间难民委员会。但此次会议没有拟定任何实际计划,也没有就救助犹太难民问题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埃维昂会议结束不久,纳粹的反犹暴行急剧升级,1938年11月9日纳粹当局在德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水晶之夜"的反犹事件,这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震动。罗斯福虽召回了美国驻德大使,以表示对野蛮行为的抗议,但是,在对待犹太难民的问题上,罗斯福政府仍然保持着消极政策。1939年年中,当载有960名犹太人的"圣路易"号轮船从汉堡辗转驶抵美国迈阿密时,尽管许多有识之士多次交涉并向华盛顿发出呼吁,但美国政府还是拒绝上岸,"圣路易"号不得不返回欧洲。《纽约时报》评论说:"'圣路易'号的航行向上苍喊出了人间的无情。"①

1939年至1941年纳粹德国先是在德国本土,继而在所有被占领国的土地上对犹太人进行丧心病狂的驱逐,犹太难民急剧增多。美国大使馆接到大量犹太人迁居美国的紧急请求,对此,美国政府表面上似乎很关注难民问题,但是不仅有没放宽对犹太移民的限制,而且国务院在实际上严格了入境签证手续,美国领事馆越来越多地拒绝签证,理由是担心难民中混有纳粹分子和共产党间谍。

1941年至1945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灭绝政策,即所谓的"最后解决"。他们把西欧、中欧以及北欧的犹太人送上开往奥斯威辛、贝尔赛克、锡比堡、切尔诺等死亡集中营的专列。消息传至美国之初,由于屠杀手段之残忍,令人难以置信,所以确有不少人怀疑这类情报的真实性,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是禁止传送这些既便是通过外交渠道得来的消息,以免在国际国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华盛顿和伦敦,人们普遍认为,有关大屠杀的消息可能会产生一种牵制力量,可能会转移盟军作战的注意力,而不利于整个战争的胜利。但是,到1942年底,大屠杀在西方已成公开秘密并引起强烈反应。12月2日全世界犹太人举行哀悼活动。12月8日,在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著名法学博士斯蒂芬·怀斯的率领下,美国犹太人各组织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美国政府为营救犹太人而尽力。至此,惯以自由、民主、正义、人道相标榜的美、英等西方国家不得不有所举措。12月17日,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同时发表了由美、苏、英等11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纳粹的屠犹暴行,并严正重申其罪责终究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联合声明对唤醒人们的良知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并没有促使美、英国家把道义上的反对变成实实在在的政策。

美国政府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强烈不满,而且也遭到了广大美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美国部分政界要员的严厉批评。面对种种压力,美国政府终于在1944年1月成立了不受国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务院管辖的战时难民委员会，该组织多方筹措资金，在意大利、摩洛哥、匈牙利、瑞典、巴勒斯坦分别建立了难民营，为营救犹太人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彻底改变了对犹太难民的一贯政策。为使营救工作取得比较大的进展，1944年春天犹太代办处和战时难民委员会等组织曾向美、英方面提出了轰炸奥斯威辛的请求，其中包括具体的建议与切实可行的方案。然而，美、英方面却给予了否定的答复。美国政府以转移目标会延缓胜利，而胜利本身就意味着犹太人的最后解放为理由，再一次来掩饰自己的消极态度。

2 三、四十年代纳粹德国的反犹暴行虽然引起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但要把道义上的反感变为政府的现实政策并非易事。美国政府对待欧洲犹太难民的政策始终是：道义上的谴责屡见不鲜，而实际行动却极为有限。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孤立主义传统下移民法规的限制。

在美国历史上，犹太移民的进入由来已久。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时，第一位犹太船员抵达北美之后，不少犹太人陆续从欧洲或南美迁居美国，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美国犹太移民已达到大约15万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大批东欧犹太人出于各种原因纷纷举家来到美国。据统计从1881年到1914年离开俄国和东欧迁徙美国的犹太人约210万人。此时，正值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之时。这些文化程度很低，生活十分贫困的犹太人很快被美国工商业界所吸收。他们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工作，积极学习，很快成为本行业的专门人才。20世纪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进入白领阶层。这种现象在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中产阶级看来，是一种严重威胁，于是一些工厂企业公开打出了“不欢迎犹太人”的招牌。与此同时，随着各种反犹势力的推波助澜，1921年美国政府便通过了第一个对犹太移民的限额法规，规定每年进入的犹太人不得超过1910年当地犹太人总数的3%，1924年的限额法规又把这一比例限为1890年当地移民人数的2%，根据这一限制，每年仅有8000名犹太人被允许入境。

三十年代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国际局势的急剧恶化，美国孤立主义再度膨胀，它强调美国在外交上应奉行一种自我保护政策，反对介入欧洲事务和国际冲突，与此相应，美国社会的排外意识也大为增强。强烈的孤立主义及排外意识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十分敏感的难民政策。在罗斯福总统当政时期，管理难民事务的国务院在犹太难民问题上奉行一种极为谨慎的政策。例如，1934年国务院曾阻止参议院通过一项谴责德国反犹行为的决议，其理由是害怕引起德国方对美国黑人政策的批评。直接负责难民事务的官员布雷肯里奇·朗一向认为，难民问题可能成为美国国内的“第五纵队”，因而他阻止了许多营救难民的努力。战争期间，美国领事馆极为严格地履行难民入境手续，对来自纳粹占领区的难民更是严加限制。难民们想要申请进入美国，首先必须缴纳多达50页的文件，证明他们的出生地点、健康状况、经济地位以及是否犯过罪，这些文件中有许多内容必须从纳粹官员手中取得。在那种恐慌和混乱的年代里，许多犹太人很难弄齐必须的资料，既便是材料齐全了，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致使“发给签证需要月复一月的时间，于是通常是发给尸体的”[2]。不仅如此，美国大使馆在审查难民资格时，“凡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均不列入限额名单，也就是说，难民们进入之时，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以保证他们一进入美国就能自食其力。这一要求对犹太难民来说很难达到，因为纳粹的反犹法令明确规定：犹太人离开德国之时，不能带走自己的储蓄或资产。这样，能进入美国的犹太人难民就极为有限了。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3年至1945年，美国对德奥犹太人的限额只在1939年满额，其他年限均未达到，这期间德奥限额仅仅使用了35.8%[3]，此间，尽管不少美国官员建议放宽对犹太难民的限额，可都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显然，在三、四十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修改美国移民法规，放宽对犹太难民的限制已刻不容缓，但是，在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始终没有解除对难民的限额制度，对犹太移民的限额法规一直延续到1965年。

第二，反犹主义势力甚嚣尘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难民政策。

19世纪以前，尽管美国个别地区对犹太移民有歧视性的限制，但从主流来看，美国社会是以平等、宽容的态度接纳了这些异邦之民，在《独立宣言》及早期的其它一些法令中，犹太人获得了和其它居民同样的平等权利。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大批东欧犹太移民的进入，美国社会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发展极快的犹太人的压力，1915年的弗兰克事件[4]导致了一场反犹舆论。此后不久，《复国长老议定书》[5]又流传到美国，引起了反犹主义者的极大兴趣。曾经得到希特勒高度赞赏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他的有70多万份销路的私人报纸《迪尔伯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思独立》上发表了许多宣传《议定书》的文章,并把这些文章装印成册,对全社会发行。在《议定书》的影响下,美国又出现了一场反犹高潮,一些反犹排犹措施纷纷出台。三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反犹势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34至1939年间,较大的反犹组织发展到105个。那时许多美国人把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归罪于犹太人。在当时的美国,充当反犹太势力代言人的是天主教神父查尔斯·E·库格林,他所组织的"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750万盟员,对犹太人进行暴力攻击,并得到了全国各反犹组织的支持。他在每周听众多达350万人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中,把犹太教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散布"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恐惧症,迷惑了不少群众。不仅如此,美国的反犹主义在政界也颇有市场,在当时的美国政坛上,替犹太人说话往往成为一件要冒险的事情,要面对强大的压力,随时都可能被戴上"不爱国"或者"试图挑拨战争"等帽子。1940年魏茨曼访美之后,十分痛心地说:美国人异常平静,好象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这个"极端中立"的国家里,谈论犹大人的悲剧就要和散布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就象一个使人更加难以忍受的恶梦,因为你必须保持沉默"⑥。

第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缺乏团结一致的努力。

当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进行大肆迫害之时,一些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竟然也流露出漠不关心的情绪。犹太人所拥有的舆论工具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对大屠杀的反应也不够强烈。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因过分热衷于建立犹太国的努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欧洲犹太人的营救。不仅如此,"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所面临的更难对付的困境是各个犹太团体之间缺乏团结一致"⑦,一些组织及其领导人在思想上、情感上过分地专注于犹太社会领导地位的争夺,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大大降低了他们在反纳粹暴政斗争中的作用。总之,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了其欧洲同胞的命运,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劝谏欧美政府首脑、疏通议员、制造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营救措施。"但总的来说,战争期间它所取得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⑧。

第四,国际环境的不良影响。

三、四十年代,英法及一些欧洲中立国一方面由于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不得不节约开支,平衡预算,穷以应付国内事务;另一方面,迫于世界局势,对战争和法西斯的恐惧心理与日俱增,因此,都不愿意涉足于十分敏感的难民问题,这种国际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了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插手欧洲事务,就是插手战争,这有悖于美国的国策。许多人甚至还担心,对难民问题的过分热心会招致德国的报复。美国参战之后,尤其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以后,虽然盟国同共同承担了打败法西斯的重任,但在许多枝节问题上,都希望对方多承担一些责任而为自己减少一点负荷。作为战争重大附属问题之一的难民问题,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利己主义观念的束缚。华盛顿方面曾经想说服英国方面开放其非洲的殖民地,以安置犹太难民,英国政府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是让美国人去做这件事吧!当魏茨曼迫切要求罗斯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明确表态时,这位总统"只是友好地微笑并不觉得自己负有什么责任",他急于关心的是丘吉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如何。美、英两国在战争期间就犹太难民问题采取了极为相似的观望政策。从理论上讲,双方似乎都在履行同样的符合务实原则的难民政策,但一接触到具体的、实质性的问题,就矛盾重重,争执不休,都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五,罗斯福总统本人的消极态度直接影响着美国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政策。

客观而论,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世界著名政治家中,罗斯福还是比较关注犹太人事务的。他上台之后,大胆任用了小亨利·摩根索、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等犹太人在政策部门中担任要职,新政的智囊团里也不乏犹太人在内。在纳粹统治时期,罗斯福总统多次被希特勒的反犹暴行所震怒,曾大声疾呼要关心犹太人问题,为此,罗斯福受到了反对派的严厉批评,也遭到了反犹势力的大肆攻击,就连希特勒也认定,华盛顿已成为犹太人世界阴谋的中心之一,罗斯福已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串通一起。所以,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都饱含着对罗斯福的深切尊敬与感激之情。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三、四十年代罗斯福本人对待犹太难民问题在行动上是消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罗斯福极为了解遍及全国的反犹主义的深度和强度,不愿为此而承担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想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保持双方的友谊,以便在未来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时,美国不会因为单方面地支持了犹太人而陷于被动。所以,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对罗斯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换取他的实际支持,其结果无非是心灰意冷。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政治家,罗斯福在对待犹太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人的同情和支持与美国国家和总统本人的实际利益两者之间，显然更偏重于后者。正如罗斯福及后来的杜鲁门总统的助理大卫·奈尔斯的分析："罗斯福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知道即使坚决支持犹太人，付出极大努力也不会得到多少实际的报偿。"⑧

3 三、四十年代，美国对待欧洲犹太难民的政策，在战争结束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犹太难民问题上，本应该也有能力更有所作为，因而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厉的谴责与批评。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有计划地消灭犹太人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漠不关心，是他总统任内最大的失败。"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希特勒发起的战争是一场两重性战争，一种是对自由世界的大挑战，另一种是对所谓劣等民族的大灭绝。正是由于盟国的袖手旁观，使这位暴虐的独裁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第二种战争的胜利。笔者认为，美国关于欧洲犹太难民问题的政策，对犹太民族、希特勒及美国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就大多数犹太人而言，美、英国家对难民问题的反应，被他们认为是一种无法原谅的遗弃，甚至是一种背叛。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忍辱负重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与盟国军队同战斗共命运，他们贡献了相当于300个师的兵力战斗在第一线，盟军中有许多犹太高级将领，有将军头衔的至少有250—350人。⑩可是令他们痛心的是，当他们的同胞在死亡线上呼救之时，惯以"救世主"姿态出现的美、英国家竟然视而不见，这一切在犹太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了震颤，使他们对非犹太世界丧失了信任感，正如一位幸存者后来所说："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房屋，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庭——我们失去了对仁爱、友谊、正义的信念"。许多犹太人经历了这场民族灾难之后，认识到了依赖他人的恩慈难以赢得民族的新生，在此心态支配下，许多犹太人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列，美国犹太人的亲犹太复国主义立场已呈压倒之势，而过去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是漠不关心，甚至主动地采取敌视态度。"⑪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成员在1932年仅有8400人，1939年增至43000人，而到战争结束时已高达20万，不仅如此，通过这场民族浩劫的痛苦思辨，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又一次得到加强，全世界的犹太人"对这种遭残酷屠杀而得不到国际声援的景况，都感到无比悲痛，深深觉悟到犹太民族今后不管遭遇任何灾难，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此外别无其他途径。……不管从世界的哪个角落迁来得以在以色列故土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⑫。

其次，就希特勒而言，他之所以能在反犹战争方面步步升级，连连得手，与国际社会的冷漠态度大有关系。早在大战爆发之前，希特勒就估计到西方民主国家不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善待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埃维昂难民会议证实了他的这一看法，他嘲笑说："这是一个可耻的例子，说明今天整个民主世界是怎样流着怜悯的眼泪，但是，尽管它显然负有帮助的责任，却对受折磨的穷人无动于衷。"⑬战争爆发之后，美、英国家在犹太难民问题上讨价还价的争执，表面上有所作为而事实上又无所作为的作法无不在客观上助长了希特勒的嚣张气焰。

注释

①转引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1页。

②③同注①第562、560页。

④利奥·弗兰克：是美国一位犹太医生，1913年他被指控谋杀了一位14岁女孩，因证据不足被减刑，而平民党党魁，托马斯在三K党的支持下，利用此案大造反犹舆论，并把费兰克劫出监狱，私刑杀害。

⑤《复国长老议定书》是1894年由俄国警察局驻巴黎办事处伪造的一份反犹文件，宣称犹太人要瓦解基督教文明，要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世界国家。这一文件流传于欧洲、美洲及中东等地，对反犹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⑥⑦⑧⑨转引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69、671、672、673页。

⑩戴维·怀曼《遗弃犹太人》纽约1986年版第11页。

⑪艾萨克·科威雷《犹太人武装抵抗运动文选1939—1945》美国1985年版第15页。

⑫同⑥第668页。

⑬五思庆译《以色列民族问题》，《民族译丛》1981.3。

⑭同①第560页。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